

第一節 走向世界並擔當責任的中國經濟

一、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着歷史上最複雜的國際形勢

當前，大國關係進入戰略疑慮增大的敏感時期。前行的道路，一條通向“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由於戰略猜疑而陷入你輸我贏的零和博弈。習近平曾指出，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¹，但大國之間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挖下“修昔底德陷阱”。另一條通向大國之間經過長期較量最終不得不從非理性對抗轉向理性對話與合作。正如習近平指出的那樣，“對中美兩國來說，合作是唯一正確的選擇”。為了構建大國之間的合作基礎，中方將始終如一地推動改革開放、法治和現代化建設，並加強中美之間的多層次溝通與協調；中方將在更高層次上繼續推動不衝突、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建設，用實際行動構建鬥而不破、開放包容、平等合作的互信基礎；中方將尋求與大國之間開展全方位合作的機遇，推動形成基於自由、公平和包容規則的國際治理新格局。

目前大國之間戰略誤判的風險在顯著上升。首先表現在把對方作為戰略競爭對手而採取全面遏制戰略。這是美國優先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一位美國前高官曾指出，美國是需要假想敵的，沒有假想敵，美國就是一盤散沙。一旦確定了假想敵，美國就會調動政治、軍事、經濟、媒體、網絡、商界等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針對假想敵開展全面持久的打擊或製造事端進而實施全面制裁措施。我國面對的嚴峻形勢是，美國兩黨、政府、商界、智庫正在

形成新的反華共識，並影響到社會各界。無論是中美全面“脫鉤”，還是美國全面推卸責任，都會把中國推向全面反制、衝突和對抗的危險境地。如果新興大國全面妥協，主動或被動放棄對守成大國的挑戰，守成大國將繼續維護霸權地位，新興大國將喪失自身的核心利益和戰略訴求。另一種可能性是陷入新冷戰，形成平行的兩大世界經濟體系。而分歧、衝突、對抗失控則可能引發熱戰，出現矛盾全面激化的極端情形。無論哪種情形出現，都不會存在贏家。

二、大國政治經濟關係面臨新挑戰

2018年，在經歷了史上經濟復甦最緩慢的艱難歲月後，世界貿易、投資和製造業等領域的增長態勢普遍企穩向好。然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告誡說，如不能化解中長期結構性矛盾，下一次衰退將會來得更早，更難以對付。據2018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2018年世界經濟增長率將由3.9%下調至3.7%，2019年中國和美國的經濟增長率將分別下調至6.2%和2.5%。世界經濟站在了一個十字路口上，繼續前行需要國際社會齊心協力，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繼續推進全球化；四分五裂則必然會陷入長期混亂。在這個關口上，美國單方面挑起了貿易摩擦，要用以美國優先定義為依據的公平貿易規則和對等開放原則為全球經濟和貿易的未來建章立制。

這裏延伸出三個基本問題：一是1870年以來基於西方規則的全球化到了一個歷史的新拐點，僅僅依靠開放經濟驅動、市場機制驅動、科技創新驅動的全球化已經難以為繼，全球不公平、不協調、不平衡、不可持續的矛盾已經累積到非解決不可的境地。英國“脫歐”，美國要推動基於公平貿易規則的全球化，公開主張貿易保護主義，那麼，基於公平貿易規則的全球化治理架構是什麼？是維護美國優先還是發展優先，將決定國際新秩序的道德基礎。二是1945年以來美國作為推動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不再願意讓其他國家搭便車，不再願意承擔更多公共產品供給的責任，不再願意承擔國際主義責

1 “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個新興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就變得不可避免。這個概念最早出現在2012年，由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院長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 *Thucydides'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the Pacific* 一文中提出，他認為“新興大國在挑戰守成大國時戰爭不可避免”。他對世界史進行研究後發現，16個類似案例中只有4個沒有爆發戰爭。他特別強調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根源就是新崛起的大國德國挑戰了當時的現存大國英國，從而引發了世界性災難。

任和義務。那麼，大國的國際責任和義務是什麼？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世界陷入混亂，老牌霸權國家英國承擔國際責任已經力不從心，新興大國美國又不願意承擔國際責任，最後的結果是希特拉等極端分子上台，把世界帶入戰爭深淵。三是1990年以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正在一步步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然而，全球化治理架構並沒有合理體現它們的利益和意志，全球化並沒有朝着更加開放包容、平衡協調、合作共享的方向發展，而是以鄰為壑，保護主義、霸凌主義盛行。

2035年之前，又可以分為三個階段：2018—2020年可能是中美各自試探對方底牌、雙方最容易發生戰略意圖誤判的階段；2021—2025年可能是中美戰略博弈最激烈最複雜也是我國採取應對策略的最重要的階段；2026—2035年可能是中美戰略博弈從衝突開始走向逐步緩和的階段。美國試圖把產自中國的2000億美元商品的關稅率加徵到25%，基本上是禁止性關稅率的效應。無論是貨幣貶值還是客戶讓利或自己消化，都很難化解25%的成本上升壓力。中國如果不讓步，2670億美元商品徵稅的可能性就會增大。兩個經濟和貿易大國貿易政策的對峙，將引發全球經濟、貿易、投資以及股市、匯市、期市等進行全面深度調整，形成不亞於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的大蕭條或大倒退。為了避免這種局面的出現，國際社會應共同努力做促進中美合作的工作，防止因選邊站隊而使整個局勢進一步惡化。

三、我國對外開放正步入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征程

當前，我國對外開放正在進入一個新的四十年的轉折期。表4-1闡述了分三個重要階段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和進程。重點是通過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構建國際一流的實體經濟體系、國際一流的跨境科技創新網絡、國際一流的現代金融和直接融資體系、國際一流的大學和人力資源，營造國際一流的營商環境、投資環境和開放環境，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

表 4-1 中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進程

年份	現代化新征程 ^①	經貿強國戰略	“中國製造 2025”	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2020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夯實經貿大國基礎	基本實現工業化	創新型國家
2035	基本實現現代化	基本建成經貿強國	製造強國中等水平	創新型國家前列
2050	建成現代化強國	全面建成經貿強國	製造強國前列	世界科技創新強國

資料來源：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及其他相關資料。¹

第一個時間節點是2020年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用3年時間（2018—2020年），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第一個一百年奮鬥目標有望如期實現。從對外開放的角度看，2020年是開放挑戰最嚴峻的時期。從全球形勢看，如何頂住“逆全球化”的潮流，頂住貿易保護主義的衝擊，繼續推動經濟全球化，繼續推動構建開放包容、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繼續推動世貿組織現代化改革等重大議題，在2020年初見端倪。從國內發展看，關鍵是要推進三大轉型：一是從代工貼牌轉向自主生產和全球貿易模式；二是從全球價值鏈低端轉向中高端和全球供應鏈管理模式；三是從簡單模仿轉向科技創新和生產率增長驅動新型貿易模式。

實現這三大轉型，需要“雙引擎”驅動，一是新形勢下的新型“雙創”驅動，即在推動高質量發展、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和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條件下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二是新形勢下的新型“雙公”驅動，即在現代化、法治化、國際化的基礎上推動政府和社會提供的公共產品、公共服務發展，包括推進開展以培養高素質人才和高技能工匠為目的的多層次職業教育和技術培訓；推進建立以科技創新、體制創新和文化創新為指向的關鍵共性技術和公共技術服務的支撐體系；推進切實落地“法無授權不可為”“法無禁

¹ 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明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分兩步走，在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止皆可為”“法定責任必須為”的法定機構，為打造開放型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創造良好條件。要在開放的範圍中和層次上進一步拓展，更要在開放的思想觀念、結構佈局、體制機制上進一步拓展。有序放寬市場准入，全面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繼續精簡負面清單，抓緊完善外資相關法律，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促進貿易平衡，更加注重提升出口質量和附加值，積極擴大進口，下調部分產品進口關稅。大力發展服務貿易。繼續推進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試點。有效引導支持對外投資。

第二個時間節點是 2035 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後。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加強創新能力開放合作，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拓展對外貿易，培育貿易新業態、新模式，推進貿易強國建設。實行高水平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寬市場准入，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保護外商投資合法權益。凡是在我國境內註冊的企業，都要一視同仁、平等對待。優化區域開放佈局，加大西部開放力度。賦予自由貿易試驗區更大的改革自主權，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創新對外投資方式，促進國際產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貿易、投融資、生產、服務網絡，加快培育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第三個時間節點是 2050 年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到那時，我國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將全面提升，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成為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領先的國家，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我國人民將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華民族將以更加昂揚的姿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中國將建成全球負責任大國（在構建國際經濟秩序和規則方面做出重大貢獻，在推進國際宏觀政策協調機制方面做出表率，在承擔全球公共產品供

給責任方面以身作則），全球開放型經濟強國，全球包容性發展大國¹。一是做好全球負責任大國。歷史上，基於西方規則的三次全球化都陷入危機、動亂或戰爭。其根本原因是，全球化的三大驅動力——開放、市場和創新都僅僅指向效率，缺少能夠實現公平、平衡、安全和協調的治理機制、治理主體和治理能力。我國將在公平、平衡、安全和協調的全球治理方面有所擔當，這是我國下一步努力的方向。二是做好全球開放型經濟大國。在全球重大需求和供給、要素投入和產出關係等方面，我國會逐步贏得話語權、定價權、規則權和逆周期的調節權，並在權力、責任和義務方面有所擔當。三是做好全球包容性發展大國。“和而不同”的開放包容，是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即尊重不同制度、文化、宗教和發展階段的經濟體和合作夥伴，創造公平參與開放型世界經濟發展機會、公平分享開放型世界經濟發展成果、公平決定開放型世界經濟治理模式，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想和行動。預期在 2050 年，我國仍然是有限度地擔當國際責任和義務。因此，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共同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治理結構和模式。

1 國際經貿規則的制定權掌握在大國手中。大國不是人口多或面積大，也不是經濟規模大或人均收入高，而是對世界經濟的領導力和影響力大。大國一般具有三種能力：一是全球市場的領導者或主導者。大國對全球市場有很強的合成議價能力，在全球市場上具有價格風向標和價格決定者的地位。如果不具有全球定價權，無論其在全球市場上所佔份額有多大，也只能算是小國。二是全球經貿規則的領導者或主導者。大國對全球經貿規則擁有決定權或主導權，在規則談判中，有舉足輕重的控制力和影響力。如果一個國家經濟規模很大，卻沒有全球經貿規則制定、修訂的主導權，那麼，也只能是個“大塊頭”的追隨者和規則的接受者。三是全球經貿調整責任的承擔者和領導者。當世界經濟或國際市場上出現了大的周期性或結構性波動時，就需要有大國出來承擔調整失衡的責任，維持全球經濟相對均衡和市場價格基本穩定。如果大國始終是順周期的追隨者和全球責任的推卸者，再大也只能起小國作用。

第二節 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世界經濟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繫、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裏，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裏，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¹然而，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世界經濟，有可能會存在一個漫長的動盪時期。世界經濟走出長期困境的根本出路之一，是從大局出發，不斷完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

一、世界經濟仍然面臨着三大突出矛盾

當前，世界經濟領域三大突出矛盾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全球增長動能不足，難以支撐世界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全球經濟治理滯後，難以適應世界經濟新變化；全球發展失衡，難以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世界主要國家對這三大突出矛盾的看法仍然存在巨大的分歧。

一是全球增長動能不足，難以支撐世界經濟持續穩定增長。這次經濟復甦是世界歷史上最緩慢的一次。2009年以來，全球人均GDP年均增速僅有1.1%，是1990年以來最低的。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2015年全球勞動生產率增速只有10年前的七成，主要發達國家只有10年前的三成。2017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全球經濟出現全面復甦態勢，但它不得不承認依然存在較長期的風險，潛在經濟增長仍較緩慢。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正威脅着全球經濟、貿易、投資以及實體經濟增長的前景。世界經濟陷入衰退的風險在增大。對於世界經濟增長動能不足的原因，人們的觀點存在分歧。一種觀點認為，是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參與經濟全球化，低成本要素競爭衝擊了發達國家中低收入人群的就業崗位，造成了中等收入人群平均收入長期停滯，

導致發達國家內部反對全球化和主張貿易保護主義的力量顯著增強，世界政治經濟和社會出現了右傾化新趨勢。另一種觀點認為，當全球化形成前所未有的世界大市場時，金融資本和壟斷資本為了獲得更大的利益，推動了信息技術泡沫和金融房地產泡沫經濟發展，形成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長期脫實向虛的趨勢，造成了主要發達經濟體的產業空心化。雖然發達國家的結構調整已經進行了10年之久並取得了成效，但仍沒有完成新舊動能的轉換。而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過去10年中的結構調整和體制創新進展較為緩慢，新舊動能轉換也進行得不順利。由此造成了全球勞動生產率增長減速，世界經濟整體增長動力不足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很好解決。2008年以來，中國經濟始終是拉動全球經濟復甦和增長的重要引擎，2008—2018年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在30%以上。然而，2018年中國經濟下行的壓力增大，而美國挑起的貿易摩擦為2019年以後的世界經濟、中美經濟蒙上了一層陰影。

二是全球經濟治理滯後，難以適應世界經濟新變化。這種失衡被形象地稱為“全球治理赤字”。如何消除這種赤字，是全球治理的第一大難題。全球治理長期由少數發達國家主導，不能體現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訴求與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如何推動全球治理民主化，是全球治理的第二大難題。如何解決發展缺位問題，是全球治理的第三大難題。目前，這三大難題不但沒有得到解決，反而越來越嚴重。作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的美國在推卸其本應擔當的全球治理的主要責任，如先後退出了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巴黎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萬國郵政聯盟、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中導條約等。下一步美國是否會退出世貿組織，將成為一項影響世界政治經濟走向的重大不穩定性及不確定性事件。美國如果退出世貿組織，就將徹底改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美國的領導下建立起來的國際經濟秩序和組織構架。那麼，國際經濟新秩序和重組後的組織機制架構會是什麼樣的格局？美國會扮演什麼角色及對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會產生什麼影響？如果美國不退出世貿組織，在美國主導下的世貿組織現代化改革是否會以“非市

¹ 2013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的演講。

場經濟導向”為藉口，形成一道把中國排除在外的諸邊規則牆¹？那麼，中國應當採取什麼樣的應對策略？

三是全球發展失衡，難以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一方面，1990年以來，發達國家普遍陷入“有增長、無發展”的困境。1%的金融寡頭獲得了最大的增長紅利，9%的富人同樣從中獲利，90%的民眾承擔了科技泡沫、金融樓市泡沫破滅的代價，長期經濟福利沒有得到改善。另一方面，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也深受1990年以來全球化伴隨的兩場大的泡沫經濟破滅之苦；同時也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美、日、歐先後採取的量化寬鬆政策所帶來的負溢出效應的影響。這些超發的貨幣並沒有轉化為美、日、歐本地的消費和投資，而是通過跨境資本流動，轉化為新興經濟體的資產泡沫的資金來源。當2015年美國經濟企穩向好，開始進入加息周期時，新興經濟體還不得不承擔發達國家退出量化寬鬆、加息、減稅、縮表、美國優先等宏觀政策調整的代價。

二、當前全球經濟治理存在的系統性制度風險

因提出“軟實力”而聞名於世的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Joseph Nye）

1 2018年9月25日，美、日、歐發表了關於貿易的三方聯合聲明，涉及世貿組織改革、國際貿易新秩序及其他影響貿易的相關議題，旨在建立以美、日、歐為核心的國際貿易新秩序、新體系。在聯合聲明中，美、日、歐一致同意推動WTO改革；一致對第三國不以市場為導向的政策和做法表達了關切；一致同意建立條件公平、對等互利的全球貿易體系，並改變貿易規則和執法程序，從體制上解決非市場化的貿易導向問題；一致認為第三國通過銀行貸款等方式進行工業補貼，會造成產能過剩和不公平競爭；一致認為第三國有企業在政府隱性擔保的庇護下進行雙重定價，嚴重扭曲了市場行為；一致對商業間諜和有害技術轉讓表示反對，並承諾採取有效手段制止有害技術轉讓。2018年10月24-25日，歐盟、日本、澳大利亞等12個經濟體貿易代表在加拿大首都渥太華開會，討論如何加強世貿組織現代化的改革議題。會後發表的聯合聲明提出要“明確和堅決支持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制度”，並從爭端解決機制、重振WTO談判職能、加強貿易政策透明度三個方面對擬議中的新一輪WTO改革提出建議主張。這次會議中國和美國沒有參加，這在一定意義上代表了世貿組織成員對推動世貿組織改革的意願和意見取向。

認為，特朗普對華政策應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爾伯格陷阱”¹。所謂“修昔底德陷阱”，是指如果一個現有大國（如美國）太過於恐懼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如中國），那就有可能爆發災難性的戰爭。但同時，美國政府還必須擔心“金德爾伯格陷阱”，也就是中國似乎太弱而不是太強。約瑟夫·奈認為，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風險可以避免，今天中美之間的實力差距遠大於1914年的德國和英國。到目前為止，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活動並非以重塑世界秩序為目的，而是為了強化其國際影響力。但如果遭到特朗普政策的壓制和孤立，中國是否會成為破壞性的搭便車者，從而將世界體系推入“金德爾伯格陷阱”之中，是特朗普在處理中國問題時所面臨的危險。他必須同時擔心太過衰弱和太過強大的中國²。

事實上，無論對中國經濟還是世界經濟，“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爾伯格陷阱”都是威脅，前者會在下一節，加以討論，後者則是當前的現實問題。回顧1918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日子，當時中國的有志之士開始探索民族獨立、人民幸福、國家富強之路。1921年成立了中國共產黨，開啟了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復興中華、包容世界的百年奮鬥史。同樣在1918年，時任美國總統威爾遜為應對英法霸權，提議建立國際聯盟，重建國際秩序，以集體安全取代大國主導的強權政治。然而，美國國會不予批准，認

1 查爾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是美國經濟學會前會長，國際經濟領域的學術權威。他對20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的歷史起源有深刻獨到的分析。他認為，在缺乏世界政府的條件下，世界經濟穩定運行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者或領導集團，提供公共產品，包括和平秩序、產權保障、開放貿易體系、自由航行、匯率穩定或國際貨幣、度量衡與各種交易規則的標準化，以及充當逆周期的調節者。只有唯一的超級大國才有能力與意願提供這些公共產品，大多數國家都會選擇搭便車。在1918年，由於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元氣大傷，已經無心也無力提供公共產品，美國則全面轉向孤立主義不願提供，世界經濟體系出現公共產品供給嚴重短缺的情況。最終結果就是當時的國際經濟秩序在保護主義的衝擊下陷入混亂，1929年出現世界經濟大蕭條，最後導致希特勒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2 約瑟夫·奈：《警惕中美關係中的兩大陷阱》，《中國經濟報告》2017年第3期。

為這會顛覆美國的孤立主義傳統¹。此後連續三任的美國總統都選擇了孤立主義。尤其是 1930—1934 年美國的《斯姆特—霍利法案》對超過 2 萬種商品徵收高關稅，挑起了全面貿易摩擦，導致全球貿易萎縮了 66%，最終使法西斯崛起，把世界重新推向大戰。孤立主義的結局是沒有一個國家是贏家。

半個世紀前的 1968 年是美國陷入越南戰爭泥潭的一年，是馬丁·路德·金遇害的一年，也是美國爆發嚴重的經濟和貨幣危機的一年。這一年，中國正值“文化大革命”。這個時期，世界經濟逐步陷入了滯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創建的旨在推動全球外匯、資本和貿易自由化的布雷頓森林體系面臨着嚴峻的考驗。在日歐經濟崛起的背景下，美國已無力承擔穩定美元匯率的責任，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美國最終放棄了黃金—美元匯兌制和固定匯率制，1973 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宣告破產。這個時期爆發了美日貿易摩擦，涉及紡織品、鋼鐵、彩電、汽車、半導體、電信等領域。即使到日元大幅度升值後的 1987 年，美日貿易逆差仍達到 567 億美元的峰值。貿易摩擦並沒有解決美日貿易不平衡的矛盾，卻導致日本付出了經濟長期停滯或低迷的代價。

三、中國的全球經濟治理觀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以平等為基礎、以開放為導向、以合作為動力、以共享為目標的全球經濟治理觀²。中國的開放包容共享的全球治理觀與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所持的單邊主義全球治理觀有巨大差距。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構建國際社會可以普遍接受，同時共享未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將決定未來的

1 在美國外交史上，始終有孤立主義和國際主義兩派之爭。孤立主義外交政策在防務上採取不干預原則；在經濟上限制與國外的貿易和文化交流。華盛頓在總統任滿時發表的《告別詞》中說，不要與任何外國建立永久的聯盟。他闡述的原則包括：一是要將美國建設成自由進步的偉大國家。二是保衛美國安全，美國必須對外國勢力的陰謀詭計和影響保持清醒的頭腦。三是美國應當與外國發展商務關係，但是要避免與它們發生政治聯繫，不要與任何國家建立永久的聯盟。直到“二戰”後，美國才轉向國際主義。

2 2016 年 9 月 3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開幕式上發表的主旨演講。

全球治理新格局。

一是全球經濟治理應該以平等為基礎。當前，對於全球經濟治理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觀念和政策，一種是堅持平等的倡議和行動，如“一帶一路”倡議。許多新興市場學者說，“一帶一路”倡議太好了，它是一個以平等為基礎，主導共商共建共享的倡議，它從中國倡議變成我們共同的倡議。另一種是堅持對等的倡議和行動。如要求新興市場採取對等的負面清單管理和市場准入措施；要求重新談判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確定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

二是全球經濟治理應該以開放為導向。不搞排他性的區域性或雙邊諸邊貿易安排，防止治理機制封閉化和規則碎片化。事實上，中共十八大以來，我們經歷了三種開放治理觀的較量和演進。第一種是基於 WTO 等多邊規則體系的開放治理架構；第二種是基於 TPP、TTIP、TISA 等排他性區域或諸邊規則的開放治理架構；第三種是基於 eWTP 等微觀交易網絡規則的開放治理架構。目前最大的挑戰是自由貿易與公平貿易之間的較量、妥協和變化。公平貿易隱含着的結論是雙邊貿易不平衡是保護主義和不公平競爭的結果，認為貿易逆差是“好夥伴”，貿易順差是“壞夥伴”。全球化必然導致貿易不平衡。意大利前總理萊塔說，民粹主義的根源在全球化。

三是全球經濟治理應該以合作為動力。全球經濟治理的重點，是共同構建公正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維護世界經濟穩定大局；共同構建開放透明的全球貿易和投資治理格局，鞏固多邊貿易體制，釋放全球經貿投資合作潛力；共同構建綠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推動全球綠色發展合作；共同構建包容聯動的全球發展治理格局，以落實聯合國 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為目標，共同增進全人類福祉。其核心詞是“合作”。然而，目前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合作觀。一種是大國間只有零和博弈關係；另一種是“和而不同”的包容，大國間可以超越零和博弈構建新型合作關係。我國積極推動後者，以合作而不是對抗的方式，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改革。

四是全球經濟治理應該以共享為目標。提倡所有人參與，所有人受益，

不搞一家獨大或者贏者通吃，而是尋求利益共享，實現共贏目標。前面已經分析了傳統全球治理有三個問題沒有解決好，即公平（全球差距日益擴大）、創新（科技、金融、房地產泡沫侵蝕了創新動力）、發展（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最不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問題）問題。“一帶一路”倡議將成為完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的主動作為和最佳實踐。

四、中國積極推動全球治理向更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1. 推動國際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推動國際秩序更加開放有效。在歷史上，人類社會曾經歷過三種不同性質的全球化。一是基於自然的全球化。如地理大發現、古代絲綢之路等標誌性跨境交往活動，推動人類社會跨境活動的普遍開展。二是基於規則的全球化。即西方主導的全球經濟貿易規則體系有序推動跨境活動的蓬勃發展。如1870—1913年，創立了國際金本位制度和自由貿易制度；1944—1973年，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和貿易自由化、便利化體系，以及世界貿易組織；1990年以來，開展全球綜合物流革命和建立供應鏈管理體系。三是基於開放包容的全球化。現代新型全球化正在逐步替代傳統標準意義上的全球化，建立了基於規則多極、開放包容、創新驅動、綠色低碳的全球治理新體系。

推動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轉型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社會基於對凡爾賽和約的反思，建立了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一系列國際治理組織，建立了能夠確保經營好世界和平、合作和發展的國際秩序和開放型經濟規則體系，形成了世界歷史上少見的高水平開放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上述組織和規則推動了人類社會進入最重要的開放期，也創造了世界經濟增長最重要的興盛期。誰能把握住全球開放期與興盛期重合的重要戰略機遇期，誰就能夠取得經濟快速崛起的實績。基於開放的東亞模式與基於趕超的拉美模式取得不同的增長業績，證明了開放的意義和作用。

推動基於和平發展規則的國際秩序創新發展。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嚴重衝擊了基於市場機制、法治體制、西方規則的國際秩序體系，充分暴露了傳統國際經濟秩序的內在制度缺陷。以G20為平台的全球治理新機制開始重塑全球化，引入“和而不同”的包容的中國智慧，引入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國方案，引入平等、開放、合作、共享的中國治理觀，進一步補充和完善現有的基於西方規則的國際秩序和規則體系。既反映發達國家的利益訴求，也平衡、公正、合理地反映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訴求。真正構建基於和平、合作和發展規則的，尊重不同社會和政治制度、不同宗教和文化、不同發展階段和具體國情的，不對抗不衝突、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全球新型合作夥伴關係。着手解決全球化中收入分配差距擴大，一部分人受益，一部分人受損的不平衡發展問題。

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全面系統地闡述了國際新秩序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夥伴關係，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促進和而不同、兼收並蓄的文明交流，構築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¹，形成了五位一體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總佈局和總路徑。

2. 建立加強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機制

建立國際財政、貨幣政策協調機制。我國作為全球負責任大國，主動參與正式非正式、雙邊諸邊多邊的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活動，逐步形成機制性安排，把宏觀政策調整的外溢影響降到最低限度。主要發達國家在經濟企穩向好的情況下，普遍採取退出量化寬鬆、加息、減稅、縮表、增加基礎設施項目投資的舉措，很容易引發新興市場資本大量外流、貨幣急劇貶值、外債負擔迅速增加、國際收支狀況快速惡化的衝擊。推動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需要從全球視野、世界責任、與中國能力相匹配的角度，逐步建立全方

1 2015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的講話。

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機制框架。在借鑒國際經驗和重視國際合作的基礎上，解決好我國有效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定位、目標、重點、機制和保障體系等重大問題，推動建立一個“戰略清晰、內外統籌、平台多元、決策科學、配合高效、保障有力”的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新機制。

建立國際貿易、投資、產業和其他結構性政策協調機制。貿易、投資產業和其他結構性政策之間的協調，首先是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堅持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敢於公開主張推進自由貿易而不是公平貿易，推進平等而不是對等，推進透明合理的投資審查而不是投資障礙。其次是在不平衡發展的背景堅持機會平等和結果平等，無論是市場准入還是參與競爭都堅持公平、公正、公開。為青年人、小企業和邊遠地區創造更好的條件參與國際交換、競爭與合作。最後是在全球經濟低速增長的背景下推動低碳綠色發展。下一步的目標包括加強推動低碳能源體系、能源立法與政策、標準制定、定價方式和治理機制的全方位國際合作和政策協調。

3. 提升全球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的能力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第一個因素是大國擔當。目前，美國、歐盟、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三者之間的關係如何發展直接影響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未來。中國作為負責任新興大國的擔當，是中國向世界提供的一項重要公共產品。中國作為全球治理的參與者、貢獻者和引領者，希望通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來建設一個公平、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和美麗家園，以改造並替代“失序和碎片化的世界”。中美關係的基礎是構建超越零和博弈的新型大國關係，增加戰略互信，減少戰略猜疑，真正做到不對抗不衝突、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美在全球治理領域有着廣泛共同利益，應該共同推動完善全球治理體系。這不僅有利於雙方發揮各自優勢、加強合作，也有利於雙方合作推動解決人類面臨的重大挑戰¹。中歐無論在經濟

政治關係上還是在戰略安全關係上都不是對手，而是全面戰略合作夥伴。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第二個因素是繼續推動全球經濟開放。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上的興盛期和開放期往往是重合的”。這個重合就是全球化時期，然而，當前的全球化有兩種前途：一個是光明的前途，繼續改善和改進全球化治理體系，推進全球貿易和投資開放，努力使全球化向公平、創新、良治的方向發展。另一個是黑暗的前途，全球化陷入間歇期，最壞的情況是出現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或七八十年代的情景。在這種背景下，“一帶一路”倡議將推動包容性的新型全球化向前發展，責任重大。一是需要建立基於公平的共商共建共享合作機制。處理好包容性、共享性、公平性發展問題，推進綠色、開放、普惠、包容、共享的跨境貿易、投資、金融、產業合作。二是需要制定基於創新的增長藍圖。解決好實體與虛擬、金融和創新、資源開發和非資源產業、人力和社會資本與物質資本之間平衡發展的問題。三是需要建立基於發展的戰略支點，統籌協調好增長與發展之間的關係，實現有增長有發展有共享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第三個因素是繼續推動全球經濟強勁、平衡、可持續和包容發展。如 G20 杭州峰會就留下了深刻的“中國治理觀”的印記，包括“六個首次”：首次全面闡釋我國的全球經濟治理觀；首次把創新作為核心成果；首次把發展議題置於全球宏觀政策協調的突出位置；首次形成全球多邊投資規則框架；首次發佈氣候變化問題主席聲明；首次把“綠色金融”列入 G20 集團議程。中國推動全球經濟發展的計劃之一，是“一帶一路”倡議。“一帶一路”倡議涉及亞歐非大陸上很多發展中國家，一些國家經濟陷入了“低水平發展陷阱”，即始終無法突破貧困的惡性循環進入經濟起飛階段；另一些國家則長期無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即無法擺脫長期發展瓶頸進入現代化發展階段。“一帶一路”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產能合作將為沿線相關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新動力。

總之，我國在積極參與和大力推動全球治理改革的過程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不管全球治理體系如何變革，我們都要積極參

¹ 2015 年 9 月 22 日，習近平接受《華爾街日報》的書面採訪。

與，發揮建設性作用，推動國際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為世界和平穩定提供制度保障¹。展望未來，我國將在進一步完善國際秩序、構建國際宏觀政策協調機制、提升全球公共產品供給能力建設等方面邁出更堅實的步伐，努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第三節 走向共享未來的世界經濟：中美關係

一、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

當前，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然而，中美關係正在進入最敏感和最容易失控的衝突期。史蒂芬斯認為，美國正在將戰後多邊主義置換為與志同道合的國家（盟國）間的特惠貿易和投資協定，讓多邊貿易協定靠邊站。沒有美國的支持，多邊秩序將進一步陷入破損失修狀況，而全球化也將會分崩離析。作為自由秩序的最大受益國，中國將成為全球化壽終正寢的最大輸家²。同時，中國也有人提出“去美國化”，要建立一個新世界秩序，所有國家無論大小、貧富，其重要利益應在平等的基礎上得到尊重和保護³。

中美關係是否只有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所描述的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衝突和對抗最終走向戰爭的傳統套路，還是像約瑟夫·奈所認為的，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風險可以避免，今天中美之間的實力差距遠大於1914年的德國和英國。然而分歧和矛盾掌控不好，可以避免的事最終還是可能發生。中美如何走向互信合作？習近平總書記提出，

“中美需要在加強對話、增加互信、發展合作、管控分歧的過程中，不斷推進新型大國關係”¹。因此，中美建立超越零和博弈的新型大國關係，合作推進經濟全球化發展，是中國贏得自己發展的戰略機遇期之關鍵。

目前，美國已經把中國定義為自己的戰略上的競爭對手²。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兩個差異最大的大國，其政治經濟關係正在進入零和博弈的衝突和對抗階段。美國學者Gilpin曾分析歷史上守成大國對新興大國的經典對策：一是採用各種手段削弱甚至徹底壓制新興大國實現崛起的可能性；二是降低本國國際事務中各種承諾和義務的成本³；三是如同羅馬帝國後期，藉擴張來佔據防守型低成本地位。在當今的國際格局中，作為守成大國的美國面對新興之中國，主要採用了前兩種對策。一方面採取各種手段遏制中國，另一方面降低本國所承擔的國際事務成本。這在一定程度上將會減少全球公共產品供給。對此，中國的回應是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積極提供全球公共產品。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那樣，合作是中美兩個大國唯一正確的選擇。當今中美利益關係已不可阻擋地交織在一起，你離不開我，我離不開你。就像2018年舉辦的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美國政府要挑起貿易摩擦，不以官方名義組團參展，但有180多家美國企業積極參展。隨着時間的推移，會有越來越多的美國企業、美國地方政府以及行業協會商會代表願意和中國交流。這說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美國政府要挑起貿易摩擦，推行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和霸凌主義，但更多的美國企業和人民還是願意和中國交流與合作。

中國希望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通過推動負面清單管理、准入前國民待遇、服務貿易開放，來推動經濟全球化向前發展，這符合中美雙方的共同利益。但在制度層面上，中美之間缺乏戰略互信。美國希望永遠當老

1 2013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於南非德班舉行的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五次會晤上的講話。

2 菲利普·史蒂芬斯：《美國的經濟衰退危及中國崛起》，《英國金融時報》2013年10月10日。

3 新華社2013年10月13日發表了英文評論。美國白宮專門召開會議討論中國官方通訊社發表“去美國化”的文章背後的政治含義。

1 習近平：《在與奧巴馬共同接見記者時的講話》，《人民日報》2013年6月9日。

2 2017年12月19日，美國政府公布了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國定義為修正主義國家，並將中國定位為美國戰略上的競爭對手。

3 Robert Gilpin, “Hegemonic War and International Change”, *Conflict After the Cold War: Arguments on Causes of War and Peace*, ed. (New York: Pearson-Longman, 2008) .

大，實現美國優先、美國再次偉大。而最可能取代美國老大地位的是中國。中國在文化、價值觀和制度上又與美國有着巨大差異，在西方人看來，中國對世界發展的影響是不確定的。從中國人的角度看，“和而不同”的開放包容共享，才是國際關係的正道。因此，增進戰略互信，減少共同利益重大決策的不確定性，是兩國合作的正確方向之一。

首先，中國保證國家實力和國際地位是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基礎。美國學者 Elvin 指出，在歷史上，中國作為大國能夠長期生存並成長壯大之道，就在於保持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和較高的科技創新能力，足以抵禦外來侵略，保證本國在世界中的地位¹。古為今用，經濟增長和科技創新依然是當今中國保證國家實力地位的最佳策略。美國也將保證其現有地位，遏制中國取代美國的一切可能性。按照 Nathan 和 Scobell 的觀點，美國應當不斷壓制中國對獲得在國際事務上的合法領導力的努力，不斷增強軍事實力，保持高精尖人才優勢，保護美國知識產權，贏得世界人心²。

其次，中國要求建立尊重本國社會制度、具體國情、文化和價值觀以及利益訴求的國際新秩序。按照西方人的觀點，中國要挑戰舊有世界秩序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這個秩序前期中國沒有參與制定，加入後中國的利益訴求又沒有受到充分尊重。因此，中國理應質疑美國維護現有國際秩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但是面對這一質疑，西方社會會不會讓步呢？按照 Ikenberry 的觀點，全球公共產品供給，將存在由大國來合法充當世界領導者，在供給全球公共產品的同時也實施治理的情況。Ikenberry 進一步論述道，一國的國內政治體制會影響其處理國際事務的方式³。而按照西方標準，中國要求的國際社會新秩序將難以被接受。對此，中國必須向世界證明，中國有意願並有能力提供公平透明、規範專業的國際社會新秩序。

最後，中國應當承擔大國責任。Leonard 認為，中美關係與美蘇關係不同，美蘇是意識形態之爭，而中美是綜合實力和經濟利益之爭。中美之間曾建立了經濟互補性合作的“蜜月”關係，但隨着中美經濟結構相似度越來越高，競爭和衝突越來越激烈，中美之間的“蜜月期”宣告結束。他還指出，奧巴馬總統在 2009 年就職後，曾希望動員中國加入現有世界秩序，確定中國在現有秩序中的利益和責任，以保持冷戰後由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但最後他失望了¹。儘管中美兩個大國之間的政治經濟競爭在不斷加劇，但中美之間仍有大量的共同利益，如美國希望中國增加對美投融資支持和擴大進口，中國則希望獲得美國建立知識經濟社會的經驗和美國先進的技術和人才。

美國單方面挑起全球貿易摩擦和中美貿易摩擦，是希望在這場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繼續為世界掌控航道和方向，按照維護美國核心利益的宗旨為世界建章立制，在未來全球秩序和政治經濟大格局中繼續保持美國優先、美國再次偉大的領導地位。同樣，我國希望在這場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保持戰略定力，始終沿着既定的方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那麼，中美關係是零和博弈還是超越零和博弈？美方認為是零和博弈，中方認為是超越零和博弈。這不僅將影響中美兩國的未來，而且將影響世界發展大勢。目前，中美關係變得非常不穩定和不確定。如何掌控分歧和矛盾，是回到基於合作的軌道上來，還是走到全面對抗的方向上去；是選擇挑戰、回應、再挑戰、再回應，還是理性和負責任地掌控大國衝突，將對世界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今世界正處於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我們要具備戰略眼光，樹立全球視野，既要有風險憂患意識，又要有歷史機遇意識，努力在這場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把握航向。因此，經過不懈努力，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牢牢把握中美關係發展基於合作的大方向，將為推動開放型世界經濟體系建設，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重大貢獻。

1 Elvin and Mark.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Palo Alto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73) .

2 Andrew Nathan and Andrew Scobell , “The Sum of Beijing’ s Fears : How China sees America” , *Foreign Affairs*. (Sep./Oct. 2012.)

3 G. John Ikenberry. “Getting Hegemony Right” , *The National Interest*. (2001) .

1 Mark Leonard , “Why Convergence Breeds Conflict” , *Foreign Affairs* , (Sep./Oct. 2013).

二、美國挑起全球貿易摩擦的緣由

美國挑起全球貿易摩擦的第一個原因是試圖建立基於美國優先的多邊貿易體系。特朗普上任以來，多次批評世貿組織現行規則對美國不公平，並威脅將退出世貿組織的多邊貿易體系。世貿組織總幹事阿澤維多表示，世貿組織要加強與美國對話，不排除按照美國的要求修改規則。同時，美國也單方面認為，中國的不公平貿易現象在過去極少被世貿組織批評並為此付出代價。2018年3月12日美國代表在要求世貿組織進行改革的文件中提出，如果一個成員未能向該組織提供有關本國確立新關稅、政府補貼或保障措施的信息披露連續超過3年，該國將被列為所謂“不活躍成員”，並且將無法獲得由世貿組織所提供的技術信息。

美國認為現行的自由貿易規則對美國不公平，要推動制定所謂的公平貿易原則的緣由是什麼？美國作為世界上唯一具有霸權地位的國家，卻認為自己在現行貿易規則和秩序體系中遭受了不公平待遇。如德國對美國有巨額貿易順差就是不公平，北約成員沒有履行2%的防務支出比例就是不公平，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中加拿大和墨西哥沒有承擔更多責任就是不公平，1990年至金融危機爆發中國GDP佔世界GDP的比重上升了13個百分點而美國下降了2個百分點就是不公平，等等。一句話，美國認為自己承擔了太多國際責任，受到太多不公平待遇，其他國家搭了美國的便車。美國要用公平貿易和對等開放原則糾正現行多邊貿易體系的不公平。事實上，多邊貿易體系是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確定的，最大限度地維護了美國核心利益，體現了美國國家意志。無論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在確定未來國際貨幣體系時選擇了美國懷特方案而放棄了凱恩斯方案，還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的第15條、第16條，都是從美國核心利益最大化角度出發的，即使其損害了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和其他成員的利益。區別在於，當時的美國總統以及以後的美國總統是站在擔當大國國際責任的立場上，而後來特朗普不願意擔當大國的國際責任。基於公平貿易和對等開放原則重塑國際經濟新秩序，意味着第二

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秩序將發生巨大調整和改變。也許需要等待10年左右的時間，大國之間的分歧、衝突和較量最終才會達成妥協方案。

美國挑起全球貿易摩擦的第二個原因是為了打造基於美國優先的全球利益格局。如美歐於2018年7月25日發表了聯合聲明，承諾要致力於消除關稅和貿易壁壘，避免當前一觸即發的美歐貿易摩擦。其利益交換的背後，是美國威脅要對歐盟汽車產業徵收20%的關稅，這意味着德國三大汽車廠商將失去美國市場。作為妥協，德國三大汽車廠商提出了零關稅的方案。美國同意不向歐盟汽車加徵關稅，歐盟則同意進口更多的美國大豆和天然氣。特朗普宣稱這是“自由和公平貿易的大日子”。然而，法國財長勒梅爾明確反對德國汽車貿易零關稅的方案，強調如果美國對汽車行業徵收關稅，歐盟應該給予“集體的、堅決的”回擊。意大利、西班牙也表示支持法國的立場。由此可見，西歐、南歐、中東歐面對美國貿易霸凌主義行徑有着不同的立場和意見。美國為了建立符合美國核心利益和美國優先原則的全球公平貿易新秩序，不惜對歐挑起貿易摩擦，對墨加兩國威脅和施加壓力，對日韓挑起鋼鐵和鋁產品的關稅戰。

美國挑起全球貿易摩擦的第三個原因是把我國作為全面戰略競爭對手。長期以來，美國維護其世界霸權地位的一個重要舉措就是實施遏制老二戰略，即當老二的經濟實力達到美國經濟規模的60%這個臨界點時，就會自動成為美國的假想敵。沒有假想敵，美國就是一盤散沙。有了假想敵，美國的國家機器就會全速動員起來，不惜煽動美國民眾的愛國主義情緒，組織發起貿易摩擦、創新戰、產業戰、規則戰甚至熱戰。我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地位，決定了美國挑起對華貿易摩擦的必然性和緊迫性。時間站在中國這一邊，絕不能再給中國寶貴的發展時間。預計美國會採取遏制與推卸大國責任的兩手交錯使用的對華戰略，在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之間構建一道貿易壁壘和規則牆。事實上，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包括霸權國家可以邊緣化中國，達到遏制中國的目的。無論是貿易摩擦、規則戰、創新戰、金融貨幣戰、產業戰、心理戰，還是動員整個盟國體系，都不可能真正達到遏制中國

的目的。唯一的可能性是中國自己犯歷史性錯誤。所以，我國最好的應對策略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以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積極舉措，一步一個腳印地填補不同階段存在的重大短板、弱項和遺漏。

美國通過單方面挑起貿易摩擦的強權方式來建立公平、對等的自由貿易原則的嘗試是不可能成功的。如在歐盟內部，西歐、南歐和中東歐之間經濟狀況的差異是巨大的，不可能滿足美國的零關稅和對等開放的要求。在歷史上，基於西方貿易規則的全球化分別發生在 1870—1913 年、1950—1973 年、1990—2008 年，但三次都陷入“逆全球化”、地緣政治衝突、局部或全面戰爭、經濟危機和貿易規則體系破產的困境。其根本原因是基於西方貿易規則的全球化推動了開放、市場化和創新，指向都是改善全球經濟效率和經濟福利，卻沒有辦法解決發達國家內部的不公平差距擴大和全球貧富鴻溝擴大等矛盾和問題。這次挑頭推動“脫歐”和貿易保護主義的是美英，這預示着世界經濟將經歷一個較長時間的風險動盪期。

從貿易學者的專業角度看，貿易逆差挑起貿易摩擦是假象。包括美國多數貿易學者在內的世界各國專家都不同意美國的貿易逆差是大問題的觀點。問題的實質不在貿易逆差，而在美國綜合國力下降。首先，美國擁有的世界霸權地位和貨幣金融特權就是通過貿易逆差為世界經濟提供國際清償手段和國際貨幣，並從中謀利。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實質，是我國用汗水生產商品廉價賣給美國，換回的是美國廉價的負債憑證而不是實際資源和要素。美國還認為不公平，要挑起貿易摩擦，迫使我國進一步進口更多的美國農產品、石油天然氣產品、電子產品，進一步開放美國佔據優勢的服務業，進一步配合美國控制加息、減稅，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必然帶來的經常項目逆差、財政赤字和居高不下的債務率。但這個故事結束了，我國已進入靠創新推動高質量發展而不是靠汗水出口推動高速增長的階段，美國挑起貿易摩擦只會加快我國從代工貼牌向發展自主知識產權、自主品牌、自主營銷渠道轉型的步伐。其次，美國利用其金融霸權和美元特權動用全球金融和貨幣奶酪，最終造成美國國民負儲蓄、低儲蓄率，這是美國形成貿易逆差的真實原因。1990 年以

來，美國高技術和中高技術製造業比重持續下降，金融、房地產和建築比重持續上升，最終導致美國經濟和產業空心化。2002—2008 年，美國所有技術領域的發明專利申請增長率大幅下降，最優秀的工程技術人才都去了金融部門，最終陷入金融危機。美國最優秀的製造企業 GE 在這場危機中差點沒有活下來，其在危機後痛中思痛，把創造公司 41% 的經營性利潤的金融部門給賣了。對此，格林斯潘、羅奇等人多次建議，提高美國儲蓄率是減少貿易逆差的根本之舉。最後，全球化和 IT 革命建立了國際工序分工體系，全球對美順差大量轉移到我國，包括美國企業在華加工組裝產品返銷本土造就的順差。事實上，世界貿易如果不用居民概念，而是用增加值統計，中美貿易不平衡程度會減半。如果用公司所有權統計，中美還會有貿易逆差嗎？因此，要抑制中美貿易不平衡趨勢，美國必須提高自身的國民儲蓄率和產業競爭力，必須創造重振製造、全球供應鏈回歸美國的產業環境和要素成本優勢，必須接受對美國的貿易逆差從我國轉移到南亞和東南亞的現實。這個調整過程應當是自然的、市場驅動的結果，而不是貿易摩擦驅動的結果。美國作為市場經濟國家應遵循市場經濟規律，而不是選擇以貿易摩擦轉嫁調整代價。

令人難以理解的是美國挑起貿易摩擦為什麼選擇失業率最低的年份。2009—2017 年是美國失業率最高的年份，美國最需要的就是創造就業崗位，為什麼不挑起對華貿易摩擦？2018 年美國失業率降至 3.8%，實現了充分就業，美國黑人失業率創歷史最低水平，在這時美國挑起了對華貿易摩擦，原因是想過河拆橋。在失業率最高的時期，美國需要我國用加槓桿的方式幫助其降低失業率。2009—2017 年我國宏觀槓桿率上升了 114 個百分點，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 30%，把美國經濟從泥潭裏拉了出來。然而，美國對我國經濟的貢獻沒有說過一句謝謝，反而以貿易摩擦回報。其是否要讓中國在未來 10 年繼續幫助它擺脫加息、減稅、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帶來的貿易逆差上升、財政赤字上升、債務率上升的困境呢？其結果是否會再現 20 世紀 80 年代美元危機的故事，再現日本付出長期停滯代價的故事，再現美國隨之贏來新科技革命和新經濟繁榮周期的故事？然後，國際經濟學界就可以發表大量

文章，給出各種論點、論據、論證說，美國挑起貿易摩擦沒有錯，都是中國人自己犯了歷史性錯誤。

美國挑起貿易摩擦的非經貿因素考量的重點是戰略猜疑。首先，美國優先是美國的核心利益，而不忘初心、復興中華是中國的核心利益。歷史上的興盛期和開放期往往是重合的。我國發展正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貿易摩擦無疑會增大我國開放的風險和外部形勢的挑戰。其次，美國挑起的貿易摩擦的實質是規則戰。從 2009 年以來的全球規則變局，無論是通過 TPP 建立美國標準的自由貿易協定範本，還是通過貿易摩擦為公平貿易原則建章立制，都是為了建立把我國排斥在外的國際經貿規則牆。當中方指出，世貿組織規則體系中沒有“市場扭曲”和“非市場經濟導向”的概念和條款時，美國試圖聯合日本、歐盟藉世貿組織現代化改革的名義，建立針對我國的市場扭曲和非市場經濟導向的指標體系和制度框架。最後，美國挑起貿易摩擦的焦點是創新戰。有關知識產權保護、強制技術轉讓要求、中國製造 2025 等方面的指責，目的只有一個：制定遏制我國技術進步來源的限制性措施。今天，我國製造業站在從代工貼牌轉向自主生產、從全球價值鏈低端轉向中高端、從簡單模仿轉向科技創新的關口。即使到 2035 年，我國製造業仍將處於世界製造業強國的中等水平，與美國的高技術服務業和製造業水平仍有相當大的差距。以我國一個指導性計劃演繹出挑起創新戰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三、我國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道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這個“道”是什麼？美國挑起貿易摩擦的“道”，是美國優先，其代價將損害包括我國在內的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我國堅守的“道”是推動全球貿易投資開放，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和發展，推動世界經濟再平衡。一是繼續推動全球開放。中華民族最刻骨銘心的歷史教訓，是“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後”。美方這次失“道”，失在推動貿易保護主義，挑起貿易摩擦不得人心；退出全球氣候變化的巴黎協議不履行大國責

任，以霸凌主義威脅中國、歐盟、加拿大、墨西哥等國家與地區讓利讓步讓位不公正。二是繼續推動全球治理改革。美方從推動雙邊回到推動世貿組織現代化改革是針對中國的，要在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之間築起一道國際規則牆。中歐成立 WTO 現代化改革工作組，合作推動多邊體制改革，擴大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同時優先推動中歐投資協定談判，提高“法無禁止皆為”的標準和範圍。三是繼續推動全球發展。世貿組織的多哈回合被稱為“發展回合”，但由於美印在農產品保障措施問題上不讓步而止步不前。美國把責任推給印度，然而，在印度農產品市場開放的問題上是 6 億個印度農民的利益重要還是 200 萬個美國農民的利益重要？美國顯然認為是美國農民的利益重要，全球發展利益不得不作出犧牲。從推動全球發展利益的角度來看，中國、印度和美國應當更多地考慮自己所肩負的大國責任，把全球發展利益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我國積極推動開放包容的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其中最重要的努力是把發展議題納入全球治理框架，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我國堅決反對美國挑起貿易摩擦的不公平貿易行徑。一方面，我國已將美國對華 340 億美元輸美商品加徵關稅之舉訴諸世貿組織，並針對美國對華 2000 億美元商品徵稅清單向世貿組織提出追訴。另一方面，我國指出對話必須建立在相互平等和尊重的基礎之上，建立在規則的基礎之上，單方面威脅和施壓只會適得其反。我們希望中美兩個大國負起責任，在維護自由貿易原則和多邊貿易體制的基礎上重啟談判。大國之間的貿易摩擦任性地持續打下去，對世界經濟和本國民眾都是不負責任的。中美回到合作的基礎上，維護和平的國際環境和穩定的國際秩序才是大局。

首先，要更加積極地推動全球化繼續向前發展，尤其是全方位合作推動全球化治理改革。這次全球化經歷了兩次泡沫經濟。美國挑起貿易摩擦的主因之一，是全球化泡沫嚴重削弱了美國的綜合國力和全球影響力，貿易摩擦的作用是為美國優先服務，同時打垮競爭者。因此，應對美國單方面挑起的貿易摩擦，就要吸取美國的教訓，牢牢把握發展實體經濟這個堅實基礎，牢

牢把握推動關鍵核心技術創新這個戰略支點，牢牢把握“一帶一路”建設所蘊含的巨大商機，同時着眼於未來全球化治理體系建設。積極推動 G20、金磚峰會、APEC 等各種平台和機制發展，探索制定基於合作的自由、公平、包容貿易規則，解決好公平參與和公平分享全球化發展機會和成果等深層次矛盾和問題。

其次，要更加積極地推動共建“一帶一路”走深走實。共建“一帶一路”正在成為我國參與全球開放合作、改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促進全球共同發展繁榮、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方案。與之相競爭的是美國方案，美國國會正努力通過一項提高美國在國際開發領域的地位的法案，計劃組建一個具有廣泛權力並擁有 600 億美元開發融資資金裁決權的新機構來與中國競爭。事實上，中美在全球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競爭將有利於促進世界經濟再平衡。當前，全球產能過剩，而“一帶一路”地區普遍短缺，基礎設施短缺問題十分嚴重。如 IMF 預測，全球基礎設施資金缺口每年高達 1.5 萬億美元，2016 年發展中國家利用 FDI 佔 GDP 的比重不到 1%，低於 2008 年的 2%。聯合國估計，共建“一帶一路”將帶動超過 1 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建設。在中國已投資的“一帶一路”項目中，約有 20% 為電力領域，19% 為鐵路建設，其他多為公路、管道和其他設施聯通領域的項目投資。要以基礎設施等重大項目建設和產能合作為重點，解決好重大項目、金融支撐、投資環境、風險管控、安全保障等關鍵問題，形成更多可視性成果，積土成山、積水成淵，推動這項工作不斷走深走實。中美在設施聯通領域的競爭，不僅有利於提升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而且有利於改善全球基礎設施建設，還有利於美國基礎設施融資服務和風險管理的技術溢出，一舉多得。同時，“一帶一路”也是我國企業轉型的必經之路。如華為在完成從“游擊隊”向“正規軍”轉型的階段，70% 以上的產品是外銷，主要進入亞非拉市場。雖然“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各種風險很高，但這裏是全球跨國公司競爭力最薄弱的地區，因此也成為中國企業培養“狼性”和核心競爭力的地區。

最後，要調動所有積極因素全面深化改革開放，補短板強弱項，培育國

際競爭新優勢。由於我國擁有世界上儲蓄規模最大的經濟，門類最齊全完整的產業體系，中等收入以上人群最多且代際更新交替速度最快的需求，最有韌性、迴旋餘地和潛力的實體經濟，最強動員能力和抗風險能力的綜合優勢，是不可能被任何外力邊緣化和打倒的，除非自己犯歷史性失誤。因此，我國要像當年加入世貿組織那樣，在外部壓力不斷上升時，實現全民總動員，萬眾一心推動高水平開放、高標準改革和高質量發展；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的全面進步和經濟的全面繁榮；推動開放型世界經濟體系建設、全球包容性發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貿易摩擦和強大競爭對手的威脅下，倒逼推動本國的高質量發展、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一個更高的台階，就能夠趨福避禍、化弊為利、轉危為機。

中美兩國作為全球負責任大國，建立超越零和博弈的戰略互信與全面合作關係，是唯一正確的理性選擇。就像兩頭大象在花園裏打架，一定會殃及周邊的花草和生靈。而把中國“和而不同”的開放包容共享文化，美國基於規則的民主法治精神與人類社會不同文明智慧交融在一起，將為解決未來全球化治理問題提供一個新思路。這是一個更長遠的目標。從可以預見的未來看，通達合作目標之路徑，將經歷一個較長的非理性較量和內外部動盪的時期。從非理性對抗到理性合作，可謂是福禍相依的漸變過程。要應對美國挑起的貿易摩擦，就必須做好趨福避禍的全面準備。一是堅持深化金融改革服務實體經濟轉型的大方向，大力發展基於有效監管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防範和化解美國單方面挑起的貿易摩擦可能帶來的金融、貨幣和國際收支領域的系統性和結構性風險。二是堅持關鍵核心技術創新加快推動新舊動能轉變的大方向，“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堅持創新是第一動力，堅持抓創新就是抓發展、謀創新就是謀未來”，有效應對和化解美國以貿易摩擦來從科技、創新和高技術產業等方面遏制中國的戰略企圖。三是堅持推動體制改革、法治建設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大方向，為企業應對美國單方面挑起的貿易摩擦創造更好的營商環境、投資環境和市場環境，形成市場機制、政府作用、社會參與的合力，在全方位開放的過程中全面提升我國的綜合實

力。2019年，美國政府對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開徵的關稅率從10%提高到25%，這對我國應對措施的效率而言既是機遇也是考驗。

四、美國挑起貿易摩擦的影響和應對之策

美國挑起貿易摩擦有可能使世界經濟和貿易衰退。2017年，全球GDP增長態勢明顯向好，2018年全球經濟增速高於1990年以來年均增長3.74%的水平。全球貨物貿易量的增長也如此，根據WTO的數據，2017—2018年全球貨物貿易量的增速分別是4.7%、3.0%，也呈現出持續向好的趨勢。如果美國執意挑起全球貿易摩擦，那麼全球貿易和經濟增長的前景堪憂。比如，近年增長勢頭較好的全球製造業，尤其是高技術製造業和中高技術製造業快速增長的勢頭可能發生逆轉。全球經濟貿易和產業失序會使衰退提前到來。

美國挑起貿易摩擦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根據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人員的初步預測，如果美國對我國500億美元商品開徵25%的關稅，預計影響我國GDP的0.10%~0.12%；如果在這個基礎上對2000億美元商品加徵10%的關稅，預計影響我國GDP的0.20%~0.25%；如果在這個基礎上再對2000億美元商品加徵10%的關稅，預計影響我國GDP的0.40%~0.45%。如果加上美國加息、減稅、增加基礎設施投資等政策的外溢影響以及其他非經濟因素的疊加影響，貿易摩擦的綜合影響將不容輕視。具體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對我國金融、貨幣和國際收支的影響不容輕視。從匯率看，2018年4月20日以後的3個月，人民幣對美元貶值7.6%，對港元貶值7.96%。5月30日以後不到2個月，人民幣對歐元貶值6.8%，對英鎊貶值4.2%。由此可見，美國挑起的貿易摩擦使我國企業、投資者和居民產生了一定的恐慌心理，形成了人民幣貶值預期。要管理好美國挑起的貿易摩擦可能對我國經濟社會方方面面產生影響的心理預期，就需要加強政府與金融貨幣市場之間的溝通，加強政府與企業、行業協會商會和投資人之間的溝通對話，加強政府與普通民眾之間的溝通，增強社會各界對當前經濟金融貿易形勢及中美關係

未來的了解，使其樹立信心。

二是對我國創新、科技和人才的影響不容輕視。當前，我國製造業大而不強。“國家隊”面臨着美國挑起的創新戰的嚴峻挑戰，“地方隊”面臨着全球市場競爭壓力增大的態勢，“民間隊”面臨着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缺位等問題，正進入從代工貼牌轉向自主生產、從全球價值鏈的低端轉向中高端、從簡單模仿轉向科技創新的關鍵時期。貿易摩擦的重點是創新戰，美國想要構建知識產權、關鍵核心技術來源、人才交流的壁壘。這迫使我們要加快轉向獨立自主，奮發圖強，自主掌握關鍵核心技術，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同時匯聚全球英才，開展全方位國際合作，增強國家創新體系中的基礎研究、基礎應用研究、關鍵共性和公共技術研究、試驗和開發研究等各個環節的競爭實力。

三是對我國體制、法治的影響不容輕視。美國是現有國際秩序的引領者、守成大國，其制度經驗和優勢是在大國長期動態博弈中積累起來的。其在規則制定、盟國體系以及現代金融、創新科技、一流人才等方面具有顯著優勢。在經歷國際金融危機等重大衝擊後，其對危機有相當強的適應能力。但美國的短板在於綜合國力和全球影響力處於衰落階段，經濟和產業空心化問題尚未真正解決，貿易保護主義不得人心，作為大國不擔當全球責任引發失序等方面。我國要學習美國的制度協調和調整能力，在大國博弈中取得制度、法治方面的進步。

2018—2025年，是中美兩個大國掌控分歧和風險最困難的時期，也是我國“十四五”規劃研究、制定和實施的時期。我國改革開放和發展的國際環境更加錯綜複雜，對外開放的風險有可能顯著大於機遇。這個階段，既不能一味迎合美國的高要價，又不能一味強調同等反制，做好中國自己的事情是關鍵，包括補好金融貨幣和國際收支、創新科技和人才、體制和法治這三塊短板，增強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能力。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我國已經發展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第一外貿大國和第一製造業大國，發展中國家第一引資大國。改革開放和發展已經進入

一個歷史的新起點和現代化建設的新階段。美國挑起的貿易摩擦，有可能演變為改變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的政治戰，有可能演變為改變世界多邊貿易體系的規則戰，有可能演變為改變世界科技革命格局的創新戰，更可能演變為改變世界經濟社會發展前景的持久戰。能否構建基於合作的公平貿易、自由貿易、包容貿易相協調的世界秩序，能否構建中美超越零和博弈的不對抗不衝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大國關係，能否構建共同維護和平的國際環境和穩定的國際秩序的合作格局，不僅將決定中美兩個大國的前途和命運，而且將影響世界的未來前景。

我國應對美國挑起的貿易摩擦的綜合優勢是明顯的。一是我國有世界上規模最大、人數最多、成長最快的中等收入以上人群的市場。無論是中國商會、美國商會、歐盟商會還是日本商會的調查結果都顯示，中國的市場資源和需求升級潛力是最大的機遇。二是我國有世界上最完善的產業體系。全球 500 多種工業產品中，中國有 220 種，產量位居世界第一。我國東部沿海地區 7 個省市的研發強度超過 OECD 的平均水平，已進入創新驅動發展階段。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將顯著提升我國現代化農業、製造業和服務業的比重。美國試圖用貿易衝突的方式讓全球供應鏈回到美國，事實證明這很難成功。三是我國有其他國家不可比擬的高儲蓄率。通過深化改革，將高儲蓄有效轉化為高質量投資，尤其是從基礎設施、房地產、一般製造業投資轉向科技創新、綠色發展和民生設施投資，同時加快推動最終消費轉向個性化、小批量、智能化、高品質、多樣性消費，將使擴大內需成為我國應對貿易摩擦的戰略支點。四是我國經濟具有潛力大、韌性大、迴旋餘地大的綜合優勢。當前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和上海、廣東、浙江，中部地區的武漢、合肥、鄭州，西部地區的四川、重慶、貴州等地正在進入新舊動能轉換、新舊結構調整、新舊模式轉型的加速期。我國內部的差異性大、多樣性高、整合性好的大國優勢，將形成很強的抗風險、抗衝擊、抗危機的綜合能力。五是我國推動新一輪高水平開放、高標準改革、高質量發展將增強應對貿易摩擦的綜合實力。決定貿易摩擦勝負的不僅僅是硬實力，更重要的是軟實力和巧

實力。影響從來都是有利有弊、福禍相依、有危有機，比的是誰能夠趨利避害、趨福避禍、轉危為機，考驗的是人心向背。美國目前是在三條戰線上作戰：第一條戰線在美國國內。美國“失道”使其不可能贏得其國內人民的堅定支持，內部複雜的利益博弈格局隨時會發生不確定性變化，反對貿易摩擦的力量在顯著上升。第二條戰線在國際。美國“失道”使其與盟友之間不可能有戰略互信，盟國體系內部的分化和與非盟國之間的對抗使形勢變得非常複雜。公平貿易依據的是美國標準，維護的是美國利益，用貿易摩擦的方式迫使他國讓渡本國經濟權利和經濟利益，是不可能持久並取勝的。第三條戰線在中國。美國“失道”將增強中國內部的凝聚力，使中國越戰越強。尤其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經濟全面繁榮的努力，將使中國更加獨立自主，奮發圖強，最終再次證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理。

參考文獻

- [1] Bhagwati JAGDISH N. Export-promoting Trade Strategy Issues and Evidence.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1988.
- [2] Krueger A.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IT Press,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1993.
- [3] Romer P. M.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PE. 1990, 98 (5): 71-102.
- [4] ZHANG S G, ZHANG Y S, WANG Z X. Measuring the Costs of Protection in Chin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8.
- [5] WANG Z, WEI S J. The Rising Sophistication of China's Exports: Assessing the Roles of Processing Trade, Foreign Invested Firms, Human Capital, and Government Policie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NBER Project on the Evolving Role of China in the World Trade, 2007.
- [6] 肯伍德, 等. 國際經濟的成長. 北京: 經濟科學出版社, 1996.
- [7] 劉易斯. 增長與被動. 中文版. 北京: 華夏出版社, 1987.
- [8] 林德貝克. 轉型期中國的經濟社會互動關係.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7.
- [9] 邁耶. 發展經濟學的先驅. 北京: 經濟科學出版社, 1988.